

# 语言接触论集

邹嘉彦摇游汝杰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摇摇本书获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  
中心资助出版

## 目 录

前言	刂	员
邹嘉彦 语言接触与词汇衍生和重 整	栽 籍 裁 月 藻 燥 皂 丑 运 援 蕴 挂 悬 耳 菓 伙 燥 燥 械 蕴 燥 部 糟 告 附 燥 燥 燥 燥 燥 栽 凿 砸 燥 蕴 蕴 蕴 蕴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员
罗美珍 巴利语对西双版纳傣语文 的影响	蕴 韵 酌 藻 藻 燥 燥 燥 燥 栽 燥 附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蕴 挂 悬 耳 菓 刮 燥 燥 燥 燥 栽 燥 燥 栽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早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猿
瞿霭堂 语言思维和语言接触	匠 哉 粤 燥 燥 早 蕴 挂 悬 耳 菓 栽 燥 燥 燥 早 栽 凿 蕴 挂 悬 耳 菓 伙 燥 燥 燥 械	源
戴庆厦 摇袁焱 阿昌族双语转型的成因及 其特点	阅 粤 陨 匠 蚤 早 燥 燥 驭 再 哉 燥 再 燥 燥 栽 燥	苑

- |                                      |   |     |
|--------------------------------------|---|-----|
|                                      | 月蓬岳素蓬皂 燥 粤 燥 燥 燥<br>燥 燥 燥 燥 燥   |     |
| 陈保亚                                  | 悦 燥 燥 月 燥 燥 燥   | 怨 燥 |
| 汉越工具质料关系词的词<br>聚有阶分析                 | 韵 灶 奈 燥 燥 再 燥 悦 燥 燥 燥 燥<br>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br>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     |
| 余志鸿                                  | 再 哉 在 燥 燥 燥 燥   | 员 燥 |
| 《蒙古秘史》总译本的时<br>体标记和特殊句式              | 栽 燥 奈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br>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br>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     |
| 顾有信                                  | 运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 员 燥 |
| 语言接触与近现代中国思<br>想史——“逻辑”中文译<br>名源流再探讨 | 蕴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br>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br>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br>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br>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     |
| 阿每龙                                  | 粤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 员 燥 |
| 名词翻译与科学传播 :以<br>清末“力学”为例             | 栽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br>栽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br>栽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     |
| 马西尼                                  | 粤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 员 燥 |
| 罗马所藏 员 燥 燥 年手稿                       | 粤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     |

本闽南话—西班牙语词典——中国与西方早期语言接触一例

迨社奈稔昏燥阅濯燥撰赠  
燥员无圆孕燥燥燥当蚤社  
酌奈忘译燥燥蚤社砾燥燥燥  
耕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

沈国威  
近代英华辞典的术语创造

奈耕旱卵燥燥燥燥 国缘  
栽燥悦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  
糟造栽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  
悦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

内田庆市  
近代西人的汉语语法研究

哉沱限粤运燥燥燥燥 国愿  
悦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

邓晓华  
试论古南方汉语的形成

阅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 国阮  
栽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

潘悟云  
语言接触与汉语南方方言的形成

孕旱宰燥燥燥燥 国愿  
蕴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

游汝杰

方言接触和上海话的形成

再栽 砾 稗 藁

阅 蚤 尊 译 蚤 悦 燥 燥 藁 藁 藁  
云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蚤 阅 蚤 尊 译 藁

猿怨

赵日新

方言接触和徽语

在 尊 的 砾 尊 蚤

云 燥 燥 蚤 早 葬 蚤 尊 尊 藁 燥  
匀 蚤 阅 蚤 尊 译 蚤 葬 孕 藁 那  
译 燥 燥 藁 燥 燥 蚤 尊 尊 尊  
葬 蚤 阅 蚤 尊 译 蚤 燥 燥 藁

猿苑

梁燕冰

粤方言区语言接触的一个现象——“把”字句的运用

蕴 裁 鼻 那 再 蚤 尊 蚤 早

栽 藁 孕 那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涌 燥 燥 燥 蚤 蚤 蚤 燥 燥 燥 燥  
栽 燥 燥 葬 蚤 悦 蚤 尊 燥 藁 葬 蚤  
悦 栽 燥 燥 燥

猿缘

吴英成 摇许小颖

语言易位过程中的方言移借变异

员 糙 匀 再 葬 早 燥 早 驭 葬 栽

栽 藁 灾 葬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造 月 燥 燥 早 蚤 蕴 葬 那  
早 孕 藁 杂 尊 藁

猿缘

梁摇敏

对语言接触和相互影响的一些看法

蕴 鼻 那 酝 蚤

杂 燥 藁 韵 尊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蕴 蚤 孕 藁 悦 燥 燥 燥 葬 蚤  
栽 燥 燥 燥

源怨

## 前摇摇头

“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是人类语言发展过程中常见的现象。不同语言或方言本身不会接触,而是要通过使用的中介人,透过书面或口头互相接触沟通的。所谓“死了的语言”,本身尚可有丰富的纪录存在,只是没有活的语言使用者,这些语言之间就不可能“语言接触”了。最常见的结果是词汇的互相借用,也可能造成语音成分和语法成分的互相渗透,从而改变语言的语音结构和句法结构。不同方言间的接触及其相互影响更经常、更容易发生,但是较难察觉。方言之间的接触主要通过口头交流的途径,语言之间的接触既通过口头交流的途径,也通过文字翻译的途径。两者都会涉及语音、词汇和句法结构三个层面。语言接触是语言或方言演变和发展的原动力之一。研究语言接触是研究语言演变的重要途径,也是研究人类文化演变过程的一种方法。这方面的研究属于理论分析,同时对推动语言规范化也有参考价值。

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于 1995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日主办“语言接触国际圆桌学术会议”(International Roundtable Conference on Language Contact)。这是在我国举办的第一次以“语言接触”为中心议题的学术会议。应邀与会宣读论文的学者有 12 位,分别来自中国内地、香港以及日本、德国、意大利和新加坡。会议请王士元先生致开幕词,王先生主要论述了语言的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的关系。本书即

是这次会议的论文集,也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以语言接触为专题的论文集。

这本论文集包括四方面的内容:语言接触的理论探讨和宏观考察;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接触问题;汉语方言接触问题;汉语和外语(英文、日文)的语言接触及其文化交流。所收论文因作者的学术背景各不相同,涉及面甚为广阔,可以说异彩纷呈。

第一篇,邹嘉彦主张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借词,不仅以语言学的视野,而且也以社会和文化的视野来研究来自外语的词汇,不管它是语音上的借用还是语义上的借用。他提出文化对“词汇输入”有兼容和制约的双重性。他进一步研究了音义兼译词和音译义注词的结构制约,认为探讨语言的内部结构对借词方式的影响,对于社会语言学是很有价值的。

罗美珍指出,巴利语作为小乘佛教的通用语言,从书面语逐渐地影响到傣族的口头语言,主要表现在文字、词的语音结构和借词三方面。四种傣文的字母都是从天城体梵文衍生而来的,字母的读音和巴利语音相同。因受巴利语影响,产生了复辅音声母,多音节词也有所增加。西双版纳和德宏两种方言吸收了许多巴利语和梵语借词。

瞿霭堂认为语言接触研究中很多重大问题,比如声调产生、语序变化、混合语的产生等,都无法简单地以形式语言学所提出的语言结构成分和语言经验的机械转移来解释,必须从新的思维观寻找答案。他以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的方法来建立新的思维观,说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并试图以此来解释语言接触中的深层现象。

戴庆厦和袁焱以阿昌语为个案,分析双语转型的成因及

其特点。作者论述了阿昌族早期“母语—傣语”双语类型的形成和半个世纪以来“母语—汉语”双语类型的崛起,指出双语类型变化必然伴随语言结构特点的变化,认为双语类型的转变,其过程是通过不同辈分的双语类型变化来实现的,其原因是语言之外的民族关系发生了变化。

陈保亚试图通过词聚有阶分析来确定汉越工具质料词的语源性质。先找出具有普遍对应特点的工具质料词,然后通过一致对应确定时间层次,再利用考古材料给工具质料词分阶,最后确定关系词的语源性质。他认为汉越语和侗台语中的“金、银、铜、锡”是铜器时代汉语和侗台语大规模接触的结果。

余志鸿全面研究早期白话文献《蒙古秘史》总译本。他认为总译本所见元代汉语的许多特殊语法现象,反映了汉语在与阿尔泰语接触和交融的过程中发生的变异,应该承认在汉语发展史中曾有过“阿尔泰语化”倾向。作者提交会议的论文长达六万多字,限于篇幅,这里仅发表其中的三部分,内容主要涉及时体标志和特殊句式。

顾有信研究了现代中国文献中相当于“逻辑”的各种词语,尤其是“逻辑”一词形成和竞争胜利的过程,指出思想史家如果要了解现代中国,必须密切注意这些译词形成的复杂过程。

阿每龙研究汉语中“重学”和“力学”这两个术语产生和竞争的历史,以及“力学”取胜的结果和原因。他指出研究科学术语对于更好地理解科学在东西方之间的传播是很重要的。

马西尼研究一本西班牙传教士在16世纪至17世纪初所编撰的闽南话词典手稿。他认为这本手稿对于东西方早期的

语言接触是很有价值的,并认为可以利用它来研究当时闽南话的音韵、词汇和方言字。

沈国威以西洋传教士编撰的三种辞书为主线,兼顾汉译西书,梳理传教士创造汉语科技术语的历史,并从词汇学角度探讨其失败的原因。

内田庆市认为在中国《马氏文通》以前没有系统的汉语语法研究,只有以虚实论为主的对个别词的解释。他初步探讨了欧美传教士在 16 世纪至 18 世纪所写的研究官话语法的著作。

邓晓华研究古代南方汉语形成的过程,认为南方汉语既非完全是“土生土长”,也不完全是“北方迁入”,而是一个多元结构体,是南方和北方各族群经过长期的语言文化互动的结果。作者从南方和北方语言文化区域、南方汉语的音韵特征和词源特征等方面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潘悟云从南方方言的语言特征出发,辅以古代南方人口来源的有关史料,论述南方方言形成之初,其主体居民是当地的土著,而非从北方南下的汉人,他们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土著语言为底层的混合语。作者又认为这种新的语言史观将导致新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他特别提出语言层次分析法。

游汝杰认为方言接触的表现或结果是方言的借用、萎缩、转用、混杂、兼用等现象。他又以上海话为实例论述典型的混合型方言的特点,即:音系混合、音系简化、音变规则不规则、同义异形结构并存并用、句法结构杂糅。他认为上海话以松江话为基础方言,后经与浙北和苏南吴语杂交,成为混合型方言。

赵日新从方言分区的角度来研究徽语的混合语性质。他认为徽语区居民的祖先是中原汉人和汉代山越人组成的。现代的徽语与吴语、官话和赣语都有共同之处。徽语与吴语的共同点可以从发生学角度得到解释,即徽语的底子是古吴语,在徽语的发展过程中又混合了一些赣语和官话的成分。

梁燕冰在分析大量文献材料和用问卷多人次调查口语语料的基础上,比较研究普通话和粤语中的“把”字句和“将”字句。她认为来自古汉语的“将”字句在粤语中仍然广泛使用,不过只是局限于一两个语义范围内。因受普通话的影响,“将”字句的使用必将受到“把”字句的影响。

吴英成和许小颖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实地调查新加坡福建社群居民的华语第五声的分布情况。根据调查结果,经过分析,他们认为造成新加坡华语第五声变异有两大制约因素:一是社会制约因素,包括年龄、华语与闽语水平、性别、住房类型、学历、语体类型;二是语言制约因素,包括华语声调与韵母、闽语入声韵尾。

梁敏有多年积累的实地语言田野工作的经验,他以国内少数民族语言为例,论述语言接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他认为在语言接触中,人口较多、科学文化水平较高的民族语言会占优势,在语言的各个层面里,词汇是最容易受影响和被吸收的,吸收借词或转用其他语言都应顺其自然,切忌揠苗助长。这种看法与本书其他论文内容可供语言规范化工作参考。

语言接触研究在六七十年代已流行于欧美,但在中国近年来才引起较多的注意,希望本书的出版有利于进一步开展对中国境内语言的“语言接触”研究。

这本论文集集中有三篇原文是用英文写的,即顾有信的

《语言接触与近现代中国思想史——“逻辑”中文译名源流再探讨》阿每龙的《名词翻译和科学传播：以清末“力学”为例》和马西尼的《罗马所藏 1570 年手稿本闽南话—西班牙语词典——中国与西方早期语言接触一例》。为了便于国内读者阅读，这里刊出的是论文的中译文。其中顾文是由多人合作译成的。所有译文都曾经原作者审阅、同意。

### 谢辞

这次圆桌会议承城市大学校方大力支持，国内外学者踊跃参加，又承高绮雯、马盈愚、戚祖耀、张钦良、方婷为会务辛勤工作，得以圆满成功。戴庆厦教授曾为会议论文集出谋划策，马盈愚小姐在编排工作上也出力甚多。在此谨向各位致谢。

编者

1978年 12月

于香港城市大学

# 语言接触与词汇衍生和重整

邹嘉彦

香港城市大学

## 提 要

摇摇“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在概念与术语方面实际上有可商榷的地方。这是因为“语言”不能自己单独接触,而是透过不同语言背景的使用者的直接接触才能接触的。所以或者可以把“语言接触”看作是一种缩略简称。同时,研究“语言接触”归根结底离不开语言使用者,最终与最重要的贡献也离不开后者。

对这种“接触”,语言学家往往集中研究语言内部可能引起的变化,例如词汇的衍生、转移与重整,语音或语法成分的单向或相互渗透,以及其他语言结构系统的变异。传统研究的焦点大多属于描述性,或尝试枚举有关词汇及其类型与数量,或探讨原模(Original Model)与仿模(Copy Model)之间的差异情况。除了简单的对应以外,实际上是认为这些都是语言系统外没有深层意义的语言现象,不是“有道理可寻”的,也就是说不能解释为什么有时可说“青霉素”,有时可说“盘尼西林”,一些地方可说“出租车”,别的地方却说“的士”

或“德士”。本文尝试通过系统的语料分析,来探索这些语言的时空差异究竟有何规律可寻。

再者,语言学家可以从两种不同的语言(或方言)之间的共同或相似的语言现象,来探索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如果假设这种词汇的相似有如基因的对称,就能够提供一个方法尝试分辨语言之间与语言使用者之间的近亲、远亲或因为“接触”而发生的近邻非亲的关系。

透过这种“语言接触”现象,我们也可以探讨有关语言使用者的群体历史与文化,包括他们的社会与文化的演变。如“茶”在中国境外分布成读如“端”母“ㄉㄢ”或“彻”母“ㄉㄞ”,这两个读音都来自中古的“澄”母两类读音,这使我们有可能寻找“茶”的传布路线。从外来新词的衍生或词汇重整,我们更可以了解到语言使用者对原社团或新社团“向心”或“离心”的心态。上述这些问题都应该由定量分析来增强有关的定性理论框架。

### 员援词汇转移和文化散播

不同的语言可以互相接触。不论是透过说话的直接交流或媒体的间接交流,不同语言接触的后果必然是跨越语言界限藩篱的文化扩散。最能具体呈现这种文化扩散,莫过于受惠语(即借词)的诞生。这些新词大致是源自对施惠语(即源语)词汇的复制:施惠语的原模“~~ㄉㄞ~~”,为受惠语提供了仿模“~~ㄉㄞ~~”,透过音译变换或意译变换的复制,新词汇品种如音译词、意译词、音译义注词、音

义兼译词因而产生。研究外来词、借词是了解、深究新词产生的阶梯。历来研究借词的方向都是集中在“借什么”、如何“借”而很少关注到为什么会有该等借词的出现。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先让我们看看人们对汉语借词的两个定义:

有些学者如吕叔湘(1980)、高名凯和刘正琰(1985)、王力(1985)和 辜振琳(1997)强烈主张把借词局限于因音译而变换的词汇。因意译变换而产生的词汇不是借词,他们只是受外语“影响”而生的新词。我们把这种主张看作是对借词的狭义定义。

另一批学者,如赵元任(1987)、高华年(1988)、邹嘉彦(1995)和 俞青(1997)则主张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借词。不论语音上的模仿或语义上的模仿,新词都反映了受外来语言文化的影响,因此,除从语言学角度外,亦应加入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外来词汇。从这个较宏观的角度出发,不单不必考虑借词与外来词原模在语音上是否相同或相似,而且还有利于研究语言与文化更广泛的关系。我们把这种主张看作是对借词的广义定义。

狭义的观点不能接受广义的观点,是因为狭义的观点是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出发,认为语言是严格地按层分级的系统结构。所以,分析音位时不允许考虑语素或语法层面,而且研究借词也不能涉及如社会和文化等非词汇因素。不少研究者严守这原则。如高名凯和刘正琰(1985)探讨了 1000 个全是音译的借词。辜振琳(1997)研究了 1000 个同类的借词。他们对这一类借词从语言结构和来源的角度进行了很好的分类,从中更归纳出一些中外文化交流现象。不过我们认为研究这些文化交流现象不必只注重对现象充分的描写,而

忽略了对现象的解释。

但从广义的观点来看,四种说法都是来自施惠语的外来语,因为 **耕替** 在这四个地方都是一项外来的文化项目。采用这观点不但允许我们全面探讨为什么有四种不同复制、仿模方法,并能更深入分析文化在语言接触中的地位和影响。如果从这个观点深入探讨,不但可以为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许多方面及其性质提供具体的线索,也可在研究中国文明历史的发展时找出别的标志,以利深入探讨语言演变的过程,具体衡量中外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

一般都认为音译借词的产生是文化接触和扩散的结果,这句话倒过来并不正确。其实,文化扩散又岂止限于或表现为音译外来词。为了探究因语言接触引起的文化扩散的全貌,不必把借词研究限于音译的一类。我们建议使用“词汇输入”(借替者去类翻替)这个概念(邹灵稼)。它跟传统定义的“词汇的借用”不同,它可以使赵元任提出的概念“语言间借用”(邹灵稼)更加精密。与“词汇输入”相似的还有“词汇替换”(借替者去类翻替)。虽然都是语言或方言间借用的结果,但应分清两者并不相同。

从历时的观点来看,“词汇的输入”是见于语言接触初始阶段,如果继续发展,有可能导致双语现象,甚至语言和文化的变化和转移(邹灵稼)。一般人不易察觉这种发展变化,因为只有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例如移民,才会经历变化的全过程。世界其他地方与美洲相比,这种变化发展更为明显,实例更多。满语和其他通古斯语言如契丹语、女真语被汉语同化,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凯尔特人的语言变化,都是全球性的语言大规模变化的实证。在美洲,也许除了 **晕替** 和 **耶替**

语言之外,没有重要的土著语言会保留下来。克里奥尔(克里奥尔语)也许是不完全转移的唯一例子。

在全球范围内,语言和文化互相接触(有时候是对抗性)的结果是占强势的一方取胜。强势和弱势的关系,表现在各个社会和文化层面上,可以是不一致的。甲乙两个社会接触时,如果乙方只在烹饪上占优势,甲方则在其他领域都占优势,结果文化扩散的方向在绝大部分领域是从甲到乙,只是烹饪方面的方向是从乙到甲。近代以来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接触也许是最明显不过:语言和文化的扩散先从“输入”(输入)开始,而继之以“替换”(替换)。例如两种文化接触,其中一种文化中的食品和烹饪方法及其名称会进入另一种文化,最终其中一部分词汇会替代本地固有的词汇,即发生“替换”现象,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接受新词者的文化。总而言之,语言和文化关系密切,因为词汇的输入引致“文化增补”,而词汇替换则导致“文化减损”。

以中日语言和文化接触为例,语言接触的结果是日语输入了大量词汇和其他语言成分,最后也导致词汇替换。先看看日语数词以及与之相搭配的名词类别(见表员)。

表 员 日语数词系统

	单用	数物	数人
员	一	一	一人
圆	二	二	二人
猿	三	三	三人
源	四	四	四人